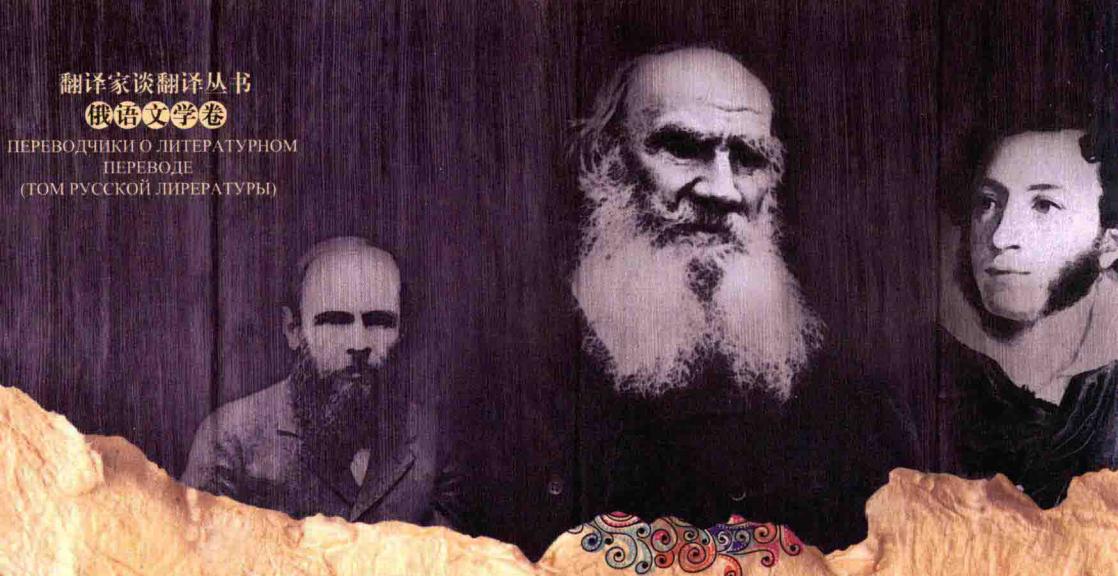


翻译家谈翻译丛书

俄语文学卷

ПЕРЕВОДЧИКИ 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ПЕРЕВОДЕ
(ТОМ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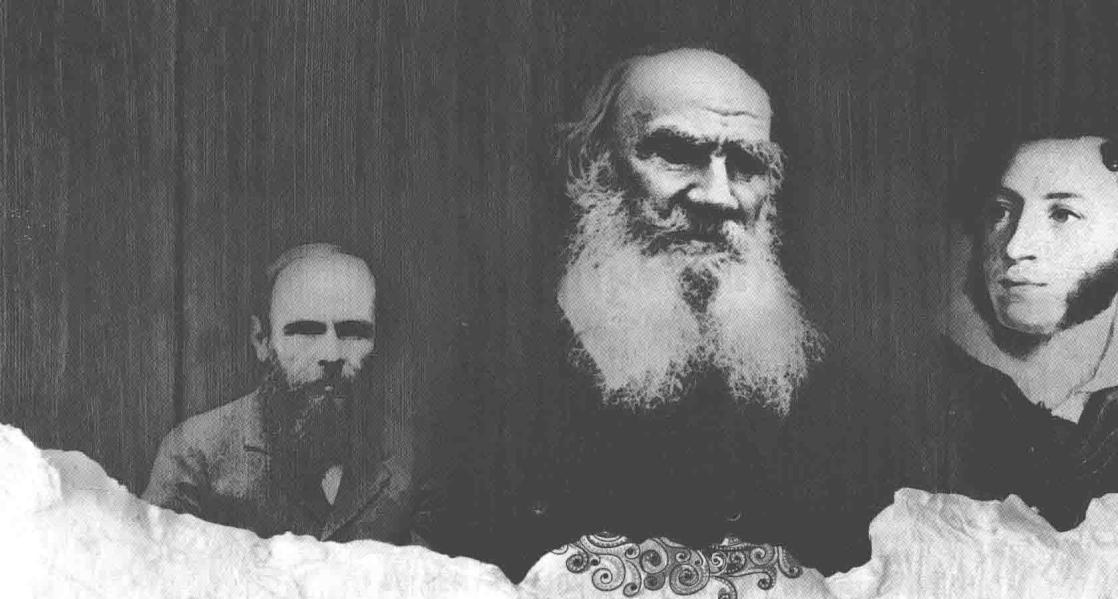
从《奥涅金》 到《静静的顿河》

高尚的理想与不懈的追求

ОТ «ЕВГЕНИЯ ОНЕГИНА»
ДО «ТИХОГО ДОНА»
БЛАГОРОДНЫЕ ИДЕАЛЫ И НЕУСТАННЫЕ
УСТРЕМЛЕНИЯ

上卷

谷羽 主编



翻译家谈翻译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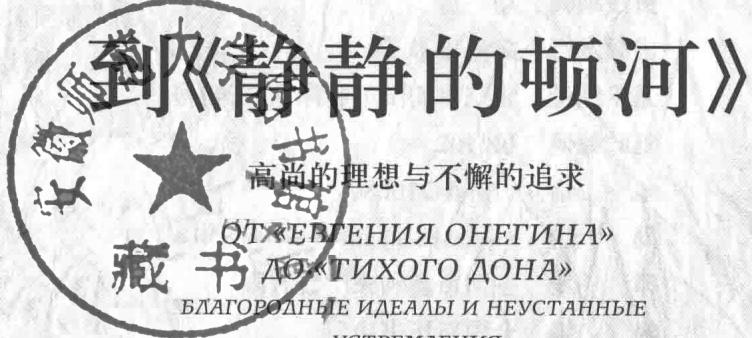
俄语文学卷

ПЕРЕВОДЧИКИ 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ПЕРЕВОДЕ

(ТОМ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从《奥涅金》



上卷

谷羽 主编

西苑出版社
XIYUAN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奥涅金》到《静静的顿河》：高尚的情操与不懈的追求 / 谷羽主编 . — 北京：西苑出版社，2016.1

(翻译家谈翻译丛书)

ISBN 978-7-5151-0549-9

I . ①从… II . ①谷… III . ①俄罗斯文学—文学翻译—文集 IV . ① I51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5254 号

从《奥涅金》到《静静的顿河》 ——高尚的情操与不懈的追求

主 编 谷 羽

责任编辑 刘 荔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3号

邮政编码 100102

电 话 010-64210080

网 址 www.xiyuanpublishinghouse.com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520千字

印 张 39.75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1-0549-9

定 价 108.00元（上下卷）

（凡西苑出版社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译事琐谈

蓝英年

俄苏文学是何时介绍到中国来的？最先介绍的是哪些作品，哪些先行翻译家特别值得我们怀念，我说不清楚。我倒见过几位著名的俄苏文学翻译家，对我是前辈，但也不是第一批介绍俄苏文学的人。我见过翻译《甲必丹之女》的译者安寿颐先生，他算早期介绍俄苏文学的译者之一，一九二〇年翻译了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但标题按音译为《甲必丹之女》，读者不知道“甲必丹”是何许人，误以为是人名而不是军衔。读过这本书的人不多，书名作为可笑的误译流传下来。但安先生仍然算介绍俄苏文学的先行者。

我一九四九年后迷恋俄苏文学，最先读的是戈宝权先生编辑的《普希金文集》。这本书是为纪念普希金诞辰一一〇周年一九四七年由上海俄商办的时代出版社翻译编辑出版的，印数只有一千多册。一九四九年第三版，我读的就是

这一版，印数也很少。收入文集的诗歌、戏剧和小说都是著名翻译家翻译的，记得其中的《茨冈》是瞿秋白先烈翻译的。《文集》中的部分译者，如姜椿芳、戈宝权、叶水夫、许磊然、陈冰夷和草婴等，我有幸拜见过。有几位翻译家虽不在《文集》译者的名单中，但同属上海时代出版社，如孙绳武、包文棣、蒋路和张孟恢等先生，还有后期进入时代出版社的满涛、王元化和楼适夷等先生，也在不同场合接触过，有的还成为师友。这批翻译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俄苏文学翻译的主力军。他们翻译的主要作品是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优秀作品，也翻译作家传记和古典作家作品。时代人选题认真，态度严肃，从不随波逐流，把一大批优秀俄苏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

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随着“一边倒”政策的深入人心，“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口号的提出，精通俄语或粗通俄语的人，不懂俄语却懂英语的人，纷纷踊跃译书，翻译苏联作品遂泛滥成灾，良莠不分。凡是苏联的作品，特别是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作品，即便是毫无艺术价值的拙劣宣传品，或污蔑中国人民的作品，通通翻译出来。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金人译）和斯捷潘诺夫的《旅顺口》（陈昌浩等译）就是这类书的典型。说得通俗点，就是坏书。《磨刀石农庄》是篇幅冗长、结构杂乱、文字蹩脚、大家齐声歌颂斯大林的低级宣传品，谁会读呢？谁又能读得下去呢？一九九九年我为核对一段引文，到图书馆借阅《磨刀石农庄》。管理员抱出四本崭新的《磨刀石农庄》，借阅证上只有一九五八年一位读者登记过。《旅顺口》讲述的是两个帝国主义为侵占中国领土在中国领土上爆发的战争。书是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四七年出版的，一九五四年作家出版社重印时，编辑并非没看出书中对中国污蔑，所以写了一篇欲盖弥彰的《出版声明》：本书有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地方，但荣获斯大林一等奖我们仍将出版云云。

毋庸置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版了一批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勇抗击德军、内战时期红军与白军拼死厮杀、战后人民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优秀文学作品，如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考涅楚克的《前线》、戈尔巴托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革拉特科夫的《水泥》、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和特里丰诺夫的《大学生》等。不管今天对这些作品如何解读，在当时确实对中国读者起过积极的、良好的影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包括我本人在内，

都曾受到苏联文学的强烈影响，决心像苏联青年一样，努力学习，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特里丰诺夫的《大学生》在北大、清华和人大等高校的大学生中间风靡一时，现在的青年很难想象。我们在校园争论，墙报上争论，课间休息时候争论，甚至在公交车上争论，随口说出书中人物的名字。《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影响更大，读者已经不限于青年学生了，大批干部也在阅读。一位老干部就曾对我说：“这本书告诉我们如何做群众工作。”

比这批书出版得稍早一些的苏联文学作品，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伊林娜的《古丽雅的道路》和科斯莫捷米扬斯卡娅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以后引起很大的争议，但对当时的青少年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并且是正面的。很多青少年学习保尔、古丽雅和卓娅、舒拉。一位知名女学者小时候热爱古丽雅，干脆把名字改成丽雅，可见痴迷到什么程度。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早于时代出版社，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过屠格涅夫选集，即《罗亭》、《贵族之家》、《父与子》、《前夜》、《处女地》和《烟》六部长篇小说。以后文化生活出版社又陆续出版过不少俄国古典名著，如果戈理的《死魂灵》和《密尔格拉得》，冈察洛夫的《悬崖》和库普林的《亚玛》等。屠格涅夫的六部长篇小说由巴金、陆蠡和丽尼三位大师分头译出。三位可敬的前辈把屠格涅夫隆重地介绍到中国来，可谓功德无量。但他们都是从英译本转译的，采用的是英国女翻译家加尼特的译本。提到加尼特不能不多说几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俄国文学被介绍到中国来，都是从日译本和英译本转译的。没有英译本和日译本，中国接受俄国伟大而辉煌的文学恐怕要晚几十年，因为中国精通俄语的人凤毛麟角。瞿秋白、耿济之和孟十还，加上比他们稍晚的曹靖华，一共有几个人？比精通英语和日语的人少得多。加尼特的译文最为优美，中国出版的很多俄国作品都是根据她的译文转译的。翻译家汝龙先生翻译的至今为人称道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便是根据加尼特的英译转译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后，从英日文转译的很多作品后大都根据原文重译了，唯独没人觉得契诃夫的作品需要从原文重译。我们也应对加尼特夫人表示感谢。

六十多年过去了，通过一代代翻译家们不懈的努力，俄苏文学的主要作家和重要作品几乎都介绍到中国来，哺育了一代代中国读者。我们应该深深地感谢他们。先行者的译文略显稚嫩，时有误译，但他们是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工具书匮乏的情况下翻译出来的，我们对他们仍然充满敬意。对诗歌翻译家应

当特别感谢，他们付出更多的辛勤劳动。诗歌是文学的奇葩，翻译起来难上加难，有人甚至认为根本无法翻译，但俄苏最著名的诗歌都翻译出来了，有的作品还出版了几个译本，成为我们重要的精神财富。我们不仅能欣赏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还可以欣赏马雅可夫斯基和勃洛克，诗歌翻译家们功不可没。

介绍翻译家的经历，交流个人的翻译经验，仿佛把几代翻译家邀请在一起，让他们介绍自己，畅谈得失，读者就像一旁的听众，听他们交谈受益匪浅。比如我读过翻译家孟十还的不少译著，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但除知道他没留在大陆外便一无所知了。读了这本书对自己从小敬重的翻译家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常想，我们今天的翻译条件比前辈翻译家不知好多少倍，可翻译作品的质量是否超过前辈了呢？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呢？这个问题太笼统，不是一两句话能回答的。但质量的优劣取决于翻译家的修养、水平和态度是无疑的。我时常怀念令人敬佩的前辈翻译家，像满涛、蒋路、汝龙和草婴等翻译大师，钦佩他们对俄苏文学真心的热爱（特别喜爱他们所翻译的作家）、极端认真的翻译态度、坚忍不拔的韧劲、深厚的国学功底。现在涌现出众多翻译新秀，令人眼花缭乱。但也出现另一类译者，他们并不热爱俄苏文学，偶然或被迫进入这片领地，把翻译当作追逐名利的简便手段。他们通过关系出版错误百出的译著，领取超过规定的稿酬。他们无端傲慢，把翻译工作视同儿戏。一次，同一位出版社的编辑闲谈，我对他说：“听说某某人一天能译五千字？”他笑着说：“老先生，您估计得太低了，何止五千字，一天译一万字的人都有。”这样的速度能不错误百出吗？奉劝他们能有点敬畏之心，少点轻慢之意。译文不可能没有错误，但同是翻译错误，这类错误却不同于严肃译者的误译。任何翻译家都可能误译，随着时代的发展，语言的嬗变，他们的译文也将被新的译文所代替。没有不朽的译文，只有不朽的作品。让严肃认真的翻译家们虚心向前辈学习，并终将会赶上或超过他们。

2014年12月

目 录



蓝英年 | 前言——译事琐谈 1

鲁 迅 | 关于翻译的通信 1

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 6

曹靖华 | 鲁迅先生与翻译 8

有关文学翻译的几个问题 22

盗火与养花的老人（高莽） 28

瞿秋白 | 关于翻译的通信 34

董秋斯 | 翻译批评的标准和重点 41

温佩筠 | 《零露集》小引 45

《零露集》后记 47

温佩筠译普希金（高莽） 48

李霁野 | 韦素园译《外套》后记 50

《被侮辱与损害的》序言 52

李霁野和苏俄文学作品翻译（李方仲） 54

巴 金 | 一点体会 61

赫尔岑《往事与回想》后记两篇 64

怀念萧珊——《黑桃皇后及其他》译本代序 69

目 录



孟十还 《杜勃洛夫斯基》后记	78
《果戈理怎样写作的》后记	80
孟十还与鲁迅（钦鸿）	81
余 振 译诗杂谈	89
朱 震 “捉螃蟹”者的脚印	107
姜椿芳 我是“杂译家”	119
我的贵人姜椿芳（任溶溶）	123
戈宝权 漫谈译事难	125
文化与友谊的使者——纪念戈宝权先生百年诞辰（高莽）	133
他把普希金介绍到中国——怀念戈宝权先生（蓝英年）	139
吕 焱 《欧根·奥涅金》译本跋	143
龚人放 谈谈文学翻译——《俄汉文学翻译词典》代序	148
满 涛 《狄康卡近乡夜话》译者序	154
汝 龙 翻译家汝龙的一生（文颖）	157
孙 玮 关于文学翻译工作的一些感想	167
辞书杂谈	169

查良铮		关于译文韵脚的说明	173
		谈译诗问题——并答丁一英先生	175
		人们将铭记他的功勋——评查良铮译普希金抒情诗（谷羽）	188
魏荒弩		谈译诗	200
		写译教论，相得益彰	
		——勇于开拓的翻译家、作家魏荒弩教授（顾蕴璞）	204
磊 然		磊然——可敬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孙绳武）	209
蒋 路		《怎么办？》译本序	212
凌 芝		蒋路与《怎么办？》	223
		怀念蒋路（蓝英年）	226
张孟恢		翻译随感	234
蓝 曼		译后碎语	240
徐成时		我如何补拙	244
草 婴		人的遭遇与书的遭遇	247
		我所认识的草婴先生（徐振亚）	250
		草婴先生的翻译启示（蓝英年）	257

目 录



任溶溶 我要一辈子为儿童翻译	260
佟 柯 文学翻译浅谈	263
黄文范 我译索忍尼辛	279
力 冈 《复活》序言：人性的复活	287
平生风义兼师友——怀念力冈教授（沈念驹）	293
翻译家力冈追忆（吴笛）	299
高 莽 译诗——难谈的学术问题	305
诗——是心灵之歌——高莽与阿赫玛托娃（谷羽）	308
程代熙 文学翻译是一项严肃的事业	312
苏 杭 叶甫图申科诗歌和他的诗歌	318
智 量 我译《上尉的女儿》	323
在苦难中实现生命的价值——王智量与普希金（王志耕）	327
陈殿兴 我译《死魂灵》	337
再谈我译《死魂灵》	340
飞 白 译诗漫笔	343

顾蕴璞 谈《莱蒙托夫全集·抒情诗II》的翻译	355
俄诗汉译的汉化与洋味	360
戴天恩 《奥涅金》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369
不息则久——戴天恩与《百年书影》(查晓燕)	372
蓝英年 简短的翻译经历	376
翻译的态度	379
戴 鴻 译书三忌——我的一点管见	381
玫瑰乎？蔷薇乎？	387
丁 鲁 诗歌是否可译	390
在诗歌翻译中使用单韵的体会	394
区分正字和衬字——节奏处理的基础	405
王守仁 叶赛宁与中国	414
姜明河 《伟大愤怒之书》——库普林及其小说《火坑》	420
田国彬 翻译普希金诗歌作品的心得体会	424
刘湛秋 译诗的神韵和自然流露——漫谈叶赛宁抒情诗的翻译	429

目 录



- 王育伦 | 《苏联诗萃》前言 435
 补记 438
- 张铁夫 | 《面向秋野》译后记 439
 甜蜜的苦役——张铁夫先生的文学翻译（曾思艺） 442
- 杨德友 | 《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译后记 451
- 沈念驹 | 有关外国文学翻译与编辑业务素养的浅见 456
 跨世纪的普希金情结——新版《普希金全集》出版之际游走的情思 461
- 谷 羽 | 俄诗汉译的音乐性及其他 471
 穿透时空的声音——《俄罗斯名诗300首》序言 484
- 谷兴亚 | “雅”无止境“化”无涯——文学翻译杂谈 490
- 常谢枫 |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美即生活”定义的论证 496
- 甘雨泽 | 我是怎样学习文学翻译的 502
- 欧茵西 | 《浪漫与沉思——俄国诗歌欣赏》绪论 507
- 徐振亚 | 《另一种生活》再版后记 514
- 陈训明 | 红莓花是什么花？ 517

- 余一中 | “姑娘”是怎样变成“老马”的? 522
《不合时宜的思想》译后记 526
- 马海甸 | 《俄罗斯的安娜》译后记 532
想起了丽尼 535
翻译家的悲剧 538
- 吴笛 | 《普希金全集》序言 541
《帕斯捷尔纳克诗选》前言 559
- 刘文飞 | 《布罗茨基传》译后 566
《布罗茨基传》译后附记 570
《抒情诗的呼吸》中译者序 574
《抒情诗的呼吸》译后记 580
- 孙越 | 我的文学翻译宿命 583
- 曾思艺 | 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语言问题 590
- 汪剑钊 | 翻译是一次生命的繁殖 595
- 谷羽 | 编后记 613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又名樟寿，字豫山、豫亭。浙江绍兴人，现代文学家、思想家。二十世纪中国大作家、翻译家，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其作品包括杂文、短篇小说、评论、散文、翻译作品。他创建了“未名社”，翻译了《毁灭》、《死魂灵》等俄苏文学作品，对中国文学翻译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关于翻译的通信



敬爱的 J. K.^[1] 同志：

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以后，使我非常高兴。从去年的翻译洪水泛滥以来，使许多人蹙眉叹气，甚而至于讲冷话。我也是一个偶尔译书的人，本来应该说几句话的，然而至今没有开过口。“强聒不舍”^[2] 然是勇壮的行为，但我所奉行的，却是“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3] 一句古老话。况且前来的大抵是纸人纸马，说得耳熟一点，那便是“阴兵”，实在是也无从迎头痛击。就拿赵景深教授老爷来做例子罢，他一面专门攻击科学的文艺论译本之不通，指明被

[1] J. K. 即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他曾主持召开“八月七日党中央紧急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书记时，犯了“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错误。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一九三五年三月在福建游击区被国民党逮捕，同年六月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杀害。

[2] “强聒不舍”语见《庄子·天下》：“强聒不舍者也。”

[3] “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语见《论语·卫灵公》。



压迫的作家匿名之可笑，一面却又大发慈悲，说是这样的译本，恐怕大众不懂得。好像他倒天天在替大众计划方法，别的译者来搅乱了他的阵势似的。这正如俄国革命以后，欧美的富家奴去看了一看，回来就摇头皱脸，做出文章，慨叹着工农还在怎样吃苦，怎样忍饥，说得满纸凄凄惨惨。仿佛惟有他却是极希望一个筋斗，工农就都住王宫，吃大菜，躺安乐椅子享福的人。谁料还是苦，所以俄国不行了，革命不好了，阿呀阿呀了，可恶之极了。对着这样的哭丧脸，你同他说什么呢？假如觉得讨厌，我想，只要拿指头轻轻的在那纸糊架子上挖一个窟窿就可以了。

赵老爷评论翻译，拉了严又陵，并且替他叫屈，于是累得他在你的信里也挨了一顿骂。但由我看来，这是冤枉的，严老爷和赵老爷，在实际上，有虎狗之差。极明显的例子，是严又陵为要译书，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赵老爷引严又陵为地下知己，却没有看这严又陵所译的书。现在严译的书都出版了，虽然没有什么意义，但他所用的工夫，却从中可以查考。据我所记得，译得最费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学》和《群己权界论》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这论，后来不知怎地又改称为《权界》，连书名也很费解了。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1]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晃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这一点竟感动了桐城派老头子吴汝纶^[2]，不禁说是“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了。然而严又陵自己却知道这太“达”的译法是不对的，所以他不称为“翻译”，而写作“候官严复达癡旨”；序例上发了一通“信达雅”之类的议论之后，结末却声明道：“什法师^[3]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慎勿以是书为口实也！”好像他在四十年前，便料到会有赵老爷来谬托知己，早已毛骨悚然一样。仅仅这一点，我就要说，严赵两大师，实有虎狗之差，不能相提并论的。

那么，他为什么要干这一手把戏呢？答案是：那时的留学生没有现在这么阔气，社会上大抵以为西洋人只会做机器——尤其是自鸣钟——留学生只会讲鬼子话，所以算不了“土”人的。因此他便来铿锵一下子，铿锵得吴汝纶也肯给他作序，这一序，别的生意也就源源而来了，于是有《名学》，有《法意》，有《原富》等等。但他后来的译本，看得“信”比“达雅”都重一些。

[1] 桐城气息指桐城派的文章风格。清代方苞、刘大、姚鼐等人主张师法先秦两汉及唐宋八大家的作品，讲义理、考据、词章，他们的创作形成一种文学流派。因为方、姚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

[2]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后期作家。

[3] 什法师（344—413）即鸠摩罗什法师，我国后秦高僧，佛经翻译家。原籍天竺（古印度），生于西域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他和弟子八百多人，曾用意译的方法，译出佛经七十四部，共三八四卷。

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译经的简单的标本，有金陵刻经处汇印的三种译本《大乘起信论》^[1]，也是赵老爷的一个死对头。

但我想，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首先要决定译给大众中的怎样的读者。将这些大众，粗粗的分起来：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识字的；丙，有识字无几的。而其中的丙，则在“读者”的范围之外，启发他们是图画，演讲，戏剧，电影的任务，在这里可以不论。但就是甲乙两种，也不能用同样的书籍，应该各有供给阅读的相当的书。供给乙的，还不能用翻译，至少是改作，最好还是创作，而这创作又必须并不只在配合读者的胃口，讨好了，读的多就够。至于供给甲类的读者的译本，无论什么，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自然，这所谓“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像吃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这里就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这样费解，怎样还可以称为翻译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倘若永远用着糊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糊涂的影子。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已有。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远的例子，如日本，他们的文章里，欧化的语法是极平常的了，和梁启超做《和文汉读法》时代，大不相同；近的例子，就如来信所说，一九二五年曾给群众造出过“罢工”这一个字眼，这字眼虽然未曾有过，然而大众已都懂得了。

我还以为即便为乙类读者而译的书，也应该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在里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必须这样，群众的言语才能够丰富起来。

[1] 《大乘起信论》解释大乘教理的佛教经书。相传为古印度马鸣著，我国有南朝梁真谛和唐代实叉难陀的译本。南京金陵刻经处一八九八年曾出版收有这两种译文的《大乘起信论会译》。